

收稿日期:2025-01-22

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文化建设与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创作

陈 红

(盐城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苏北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为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创作注入了活力。美术工作者将苏北抗日根据地地域性文化元素融入美术作品创作,极大增强了革命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深度,使其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地域文化影响下,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作品的呈现特点突出,主题鲜明,这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苏北抗日根据地;革命题材;美术作品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3-0028-0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四军江苏抗日根据地革命题材美术创作研究 1938—1945”(23YSB022)。

作者简介:陈红(1976—),女,安徽淮北人,盐城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抗战文化史、新四军美术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3.029

革命美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会受到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地域性文化与革命美术创作的紧密结合,不仅能让当地人民群众迅速接受革命美术作品,而且会使美术作品更具有灵性和生命力,更好地促进美术创作的升华与创新。苏北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为苏北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美术工作者将丰富的地域性文化元素融入美术创作中,极大增强了新四军革命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深度,使作品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的动因

(一)趋于抗战形势所需,强化文化对群众的启发

1940年11月23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移驻苏北盐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苏北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但就文化而言,苏北“文化虽不如江南之普及,但比任何内地省份较为发达”^[1]。然

而,由于苏北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镇江等地比较近,致使苏北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思想上长期受着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统治,对新文化、新思想处于无知或少知的状态,实际上盛行着一种“愚民的文化”。早在1940年11月,初到苏北不久的陈毅就明确指出:“苏北的文化发达,这指的那一愚民的文化发达,而不是科学的民主的合乎抗战要求的那一种文化的发达。”^[2]

1941年7月,日伪发动对盐阜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妄图在军事上摧毁新生的军部与新建立不久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在军事“扫荡”后,日伪不断地向苏北民众渗透殖民文化和汉奸文化,以达到愚昧民众,清除民众反日活动之目的。到1940年底,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三年半,抗战文化早已在全国兴起。在苏北,虽然一些进步的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然而由于人数少、范围小、影响力不大,使敌伪活动变得更加猖獗,反动势力不断涌现,造成了苏北地区民族革命及革命文化的危机。面对这种形势,苏北抗日根据要想迅速壮大,当务之急在于用新文化启发群众的觉悟,利用新文化唤醒群众的民族精神,以尽快打破长期以来封建专制文化、日伪奴役文化对苏北根据地群众的思想禁锢,使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投身于民族抗战及根据地各项建设中,从而迅速打开抗战局面。1941年4月16日,在刘少奇、陈毅等大力支持下,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成立,提出要“普遍深入地开展苏北的新文化运动”^[3]。

(二)源于使命召唤,担当解放劳苦大众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刘少奇、陈毅领导下开展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为了彻底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刘少奇在苏北文协代表大会上动情地说:“应该吸收一切的人民,连农村中的老太婆、厨娘及小孩子等,均参加到这个文化运动中!都要使他们从黑暗、愚昧、盲从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5]

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随着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根据地人民开始当家做主,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但在文化上讲来,他们依然是落后的”^[5]。为改变这一现象,陈毅明确表示,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文化运动就是为全国工农大众及一切抗日人民所欢迎、所把握、所积极参加、所创造的文化运动。它以广大工农劳动人民为对象,为他们服务,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解放工农的最后目的”^[2]。由此可见,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是与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相联系的。然而,“工农大众的彻底解放,不仅要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还要体现在文化上的彻底解放,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文化上的解放则在于发动所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文化运动,让人民群众了解文化、参与文化、欣赏文化,从而自己解放自己。这种文化运动是与抗战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新运动”^[6]。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新文化运动能够提高人民的素质,激发人民的民族情感,凝聚人民抗日救亡的巨大能量。

(三)出于战略谋划,树立苏北新文化的典范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共中央与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关于华中抗战的重大战略谋划。1940年10月10日,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部与南下的八路军一部在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共同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对于大力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谋而合,都希望依靠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来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10月14日,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时说:“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情,去投资兴办实业,以此来帮助巩固苏北根据

地。”^[7]这就为刘少奇、陈毅等在苏北的新文化运动实践设计了一张蓝图,对苏北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0年11月下旬,陈毅在海安主持召开欢迎上海到达苏北的文化工作者座谈会。陈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建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之开始”^[2]。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刘少奇力主团结在苏北的广大文化工作者,把苏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做好,进而“推动整个苏北抗日民主运动的前进,推进中国走向独立与民主自由”^[3]。陈毅在苏北文协成立大会上呼吁文化界人士:“为了完成同一的任务——坚持抗战,争取解放,配合着党政军民的力量而斗争到底,一定把苏北的文化事业做好,然后再推广至全中国。”^[8]

二、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发展历程与内容

(一)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概念。它不仅是对苏北传统优秀文化的新发展,而且也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同时,因与抗战紧密相连,又具有抗战年代所赋予的特殊内涵。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始终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为启发民众、呼唤救亡、凝聚民心、鼓舞战斗与讴歌抗战的有效工具。因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是“为全国工农大众及一切抗日人民所欢迎、所把握、所积极参加、所创造的文化运动”。具体来说,一方面,这种新文化运动是“反对敌寇汉奸殖民地化中国的旧文化,反对中国半封建的愚昧、黑暗、倒退、盲从的旧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3];另一方面,“要求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要求彻底改造旧制度,要求以广大人民为对象,进行扫除愚昧,提高知识水平,提拔天才,普及并提高人民的文化享受”^[2]。

(二)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

1940年11月下旬,陈毅在海安主持召开的“文化人座谈会”拉开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化人座谈会”召开以后,先期抵达苏北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抗敌剧团,以及著名文化人丘东平、许幸之、许晴、孟波、何士德等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建设的先锋战士。他们传唱易为人民群众接受的歌曲,深入青年学生向他们灌输新文化,组织剧团到农村演出话剧,积极创作宣传画、壁画、木刻版画、墙画等美术作品,促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把新文化建设作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要的工作提出来,积极引导上海等地的知识分子来到苏北。刘少奇呼吁苏北文化人要“普遍深入地开展苏北的新文化运动”,并要求他们把新文化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3]。同时,为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创办报刊,大力支持建设新的文化单位。至1941年7月,刘少奇、陈毅以及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者在《江淮日报》《江淮》等报刊发表了关于新文化的系列文章。新四军还在苏北盐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苏北文化协会等,这些文化单位的成立表明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人的大团结,标志着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有了巨大发展。

1941年7月,日伪发动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文化单位、学校随着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转向农村。广大文化人走向农村,与工农兵结合,走大众化的创作道路成为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在农

村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普及农村学校,帮助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学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与此同时,文化工作者也在农村建立了专业的文艺团体,如涟东青年服务团、淮海文工团、盐阜区党委文工团以及各县的文工队等。在创作题材上,文化工作者通过“墙头诗”这一容易被战士和群众接受的文化形式,大大促进了乡村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促进苏北地区上层文化交流,陈毅策划并主导成立了“湖海艺文社”,团结了苏北地区上层社会的开明士绅、社会名流。陈毅与戏剧家阿英等著名文化人还在阜宁建立了“文化村”,作为苏北地区文化人的聚居中心和文化交流场所,极大地促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42年12月,日伪再次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撤离苏北,转移至盱眙黄花塘。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多数文艺团体被迫解散,苏北新文化运动受到重大打击。1943年春天,经过新四军三师、一师和苏北民众的英勇斗争,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此后,苏北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逐步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苏北的报纸上公开转载发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随即开展认真学习。新四军三师师长兼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指示阿英筹备召开苏北文艺座谈会,“并要求苏北文化教育界团结在民主政府周围,致力于新文化工作,发展新文化事业”^{[9]21}。

为继续推行新文化运动,1943年4月,盐阜区创办《盐阜大众报》,成为普及大众文化的一条重要渠道。盐阜区和淮海区下辖各县成立专业文工团数十支。苏北各地农村剧团和战士剧团纷纷成立。“涟东县四五天时间就组织了20个农村剧团和文艺宣传队;10月中旬,阜东县成立了58个俱乐部;阜宁县周门、沙淤7个乡以46个民间艺人为骨干组织了7个农村剧团和26个农村俱乐部”^{[9]22}。1944年,为了使根据地新文化运动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著名文化人范长江、王阑西、阿英、章枚、钱毅等从理论上对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进行讨论、阐述与总结,再次促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的发展与提高。

(三)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不仅依靠军事侵略,而且积极利用文化侵略,企图把中国人民变成“顺民”,配合其军事政治侵略进而完成对中国完全占领的任务。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不遗余力地推行奴化政策,妄图维护日伪在华中的统治。此外,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在华中的文化统治,其突出表现就是积极推行党化政策,不容许思想言论自由,极力压制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在根据地继续推行“愚民”政策。在此严峻形势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日伪顽的斗争,努力“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2]。

首先,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1941年初,陈毅明确提出,“苏北的文化工作任务,就是服从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总任务”,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抗战的、科学的”,具体来说,它“要求民主反对黑暗的压迫,要求自由反对野蛮的专制,要求科学反对盲昧的迷信”^[2]。4月16日,刘少奇在苏北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3]。在刘少奇、陈毅等人的倡导与支持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创作涌现出大量以抗日、爱国与民族独立为主题的作品,如许幸之的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丘东平的小说《茅山下》、抗日歌曲《新四军万岁》、美术作品《激战》《向敌人腹背进军》等,都生动地再现了苏北根据地军民不怕困难、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同时,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必须是“科学的”。因为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要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就必须给根据地群众新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教导群众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努力使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

其次,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大众的新文化。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是与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相联系的,它“要求以大众为文化工作的对象,反对包办垄断为一阶级一党派所专用”^[2]。苏北抗日根据地“工农大众的彻底解放,不仅要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还要体现在文化上的彻底解放,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文化上的解放则在于发动所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文化运动,让人民群众了解文化、参与文化、欣赏文化,从而自己解放自己。这种文化运动是与抗战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新运动”^[6]。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工作者通过对传统戏曲、秧歌、美术作品的创作手法进行改造与创新,使其贴近群众,易于被根据地军民接受和喜爱。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宣传中,文化工作者为了让文化知识更好地在根据地群众间传播,还通过推行简化字、兴办学校等举措,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最大限度地团结根据地人民共同抗日。

再次,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艺术的新文化。随着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把美术作为支援前线、抗日救亡的一支生力军,把美术置于与文学、戏剧、音乐并重的地位。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人积极“出版报纸杂志,开会演剧歌咏,极个别的城镇建立了民众娱乐部、民众画廊等”^[8]。苏北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化法令,制定了系列文化教育政策,大大促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美术工作者深入战场、农村,走到战士和普通民众中间,积极搜集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内容丰富、样式新颖,具有苏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宣传画、壁画、报刊书籍插画、漫画、木刻版画等,这些美术样式紧密结合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成为团结苏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三、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创作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形式多样且贴近群众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吸引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参加抗战与根据地建设,凝聚同仇敌忾、抗日卫国的向心力,而且对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革命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为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情感和思想,是当时美术工作者创作革命题材美术作品的表达方式和灵感源泉。苏北地区人民群众的春节送祝福、日常生活打渔为生等素材均成为新四军美术工作者创作的重要素材。如吕苒僧的《“福”字图》与李可弱的《捉鱼》等作品^①,就非常生动地反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美术工作者通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化、社会现实和军民生活的深刻观察,其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意蕴。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美术工作者只有用战士们和普通人民群众看得懂的绘画作品进行革命宣传,才能真正动员他们投身于抗战和根据地各项建设之中。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作的多种样式的革命题材美术作品,是革命战士和普通群众赖以坚持抗战的精神食粮和支柱。如军鲁工团发现淮海区农民每逢春节都要在牛栏里贴一套或者几套“牛印”的习俗,便参照“牛印”的基本形式,以发展生产和坚持抗战为主题内容,运用新的表现技法和风格创作出了宣传党的政策的新“牛印”作品,在春节时分赠给附近的农民,得到了农民的喜爱。如凡一《向劳动英雄拜年》等作品

^① 本文列举的美术作品原图,均出自杨涵编《新四军美术工作回忆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附图”,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即为代表作^[10]。美术工作者通过自觉地吸收抗日根据地的优秀传统文化,遵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作理念,把视角转向工农兵群众,创作出大量鼓舞人心的美术作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自觉地以美术为抗战服务,“将美术视为唤醒人民的工具,鼓舞人民的号角,打击敌人的武器”^[11],从而创作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革命美术作品。

苏北抗日根据地革命题材美术作品运用图像语言,“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和根据地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把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奋斗不息、自强不息的的雄伟形象具体化”^[12],充分表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昂扬的主旋律。战场上,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收集创作素材。战后通过对抗战场景及英勇事迹素材的整合、提炼、概括,运用简朴的铅笔勾线,施以淡色,就能够把硝烟弥漫的战场、英勇无畏的战士事迹等创作成连环画或版画,通过视觉符号展开生动叙事。

(二)增强了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优秀文化通过其革命题材美术作品来展现,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又蕴含深厚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内涵,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促进。著名木刻版画家沈柔坚在苏北地区工作期间创作的作品,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人民的生活。如木刻版画作品《坚持原地斗争》,以突出主体人物的构图形式,形象地刻画了抗日游击队员在相互探讨“坚持原地斗争”等重要问题时的情景,表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对新四军英勇抗敌斗争的配合与支持。苏北抗日根据地革命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密切相关。革命题材美术作品作为文化传承及表达的载体,深深地扎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土壤之中,为动员苏北人民群众投身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新型的文化审美价值,正是由于它所诞生的时代是民族命运大拼搏的时代,激烈拼搏的时代精神本身就决定了美的内涵只能是抗战的、雄壮的阳刚风格。王德威于1944年创作的石版画《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刻画了新四军战士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奋勇突围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悲壮场景。石版画表现了新四军战士钻过敌人的铁丝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对敌人进行突袭的激烈场面,充分展现了新四军战士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具有厚实、质朴、纯真的美,其美术作品笔调粗犷,浓抹淡涂总相宜”^{[9]26}。为了宣传抗日,新四军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反映实际生活及斗争的美术作品。通过指导群众创办墙报、黑板报、出版刊物,定期向群众分发他们创作的漫画及连环画等,提高与增强民众的抗战意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念。革命题材美术作品既是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叙事的“语言”,又是它本身的视觉呈现,是美术工作者用不同的艺术语言和风格讴歌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三)彰显了新四军革命题材美术作品的抗战主题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使苏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自由与民族尊严的重要战场。在此背景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题材美术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抗日主题极为鲜明,情感深沉而强烈。

顽强战斗:出其不意打敌人。芦芒的木刻版画《向敌人腹背进军》是一幅反映新四军将士出其不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珍品。画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似钢针一样的暴雨在急速下落,而新四军将士则冒着疾风骤雨急行军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作者“以刚柔兼有的刀法,奔腾热烈的细密线条”,刻画了新四军不畏艰难险阻,以恶劣天气为掩护,出其不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主义气

概。可以说,这幅木刻版画“既凝聚着诗人的艺术灵感,又糅合着画家的艺术才华,是作者以诗情借助版画语言表现的产物”^[13]。该幅版画作品的创作不仅是对新四军将士英勇顽强战斗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的艺术呈现和纪念,而且对于传承和弘扬新四军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英雄塑像:铁血丹心照汗青。1943年秋,芦芒设计并完成了雕塑《芦蒲新四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上是一尊比真人高大的新四军烈士英雄像,屹立在“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顶部。这尊新四军英烈塑像全副武装,高举枪支,眼神坚定,似乎喊着“起来!战斗!”的口号,蕴含着决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信念。雕像不仅展现了新四军英勇无畏的战斗姿态,更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军民情深:鱼水情深共抗敌。莫朴于1941年创作的木刻版画《斗争在苏北敌后》,是一幅具有地域特色、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版画作品,画面展现了盐阜军民一心的战斗生产生活场景。画面核心位置,一头壮实有力的水牛正在水田中劳作,旁边的新四军战士正和农民亲切交谈。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人物姿态各不相同,如此亲密和谐的氛围,体现了新四军战士与苏北人民之间亲如家人的军民情感。作者将两个群体的众多人物组合的精心设计,使画面更加饱满而丰富,充实而不显拥挤,既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具有非常高的政治宣传意义。该作品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正是这种鱼水情深的关系,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胜利曙光:曙光初现照前程。莫朴的《迎接1940年》是一幅充满希望的木刻版画作品,画面中的主体人物是一名中国战士脚踏日本士兵,并挥动手臂与城墙上的战友们欢呼的情景。站立的中国士兵与倒在地上的日本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天空的亮部处理,蕴涵着当时人们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该作品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历史的见证和精神的传承,透过作品的创作理念,受众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感受到那份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空间环境,苏北地域文化“所表现的独特的民族心理、风尚习俗、文化行为”^[14],在特定的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构成了新四军与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抗战的总基调。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开展过程中,广大美术工作者坚持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抗战现实服务的指导思想,以文化为武器,颂扬民族抗战、爱国热情、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启发、鼓舞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伟大实践,使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文化运动跃身为人民革命事业的重要一翼。这不仅提高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广大战士的文化素质,而且犹如一支催化剂,激发出强大的抗日救亡能量,成为促进抗战胜利的有效工具。苏北抗日根据地美术工作者在创作美术作品时能够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注重从创作的内容出发,强调以抗战与人民生活为主题进行创作。他们坚持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前线的创作道路,创作出大量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及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题材美术作品。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 [1] 发刊词[N].盐阜报,1942-01-10(1).
- [2] 陈毅.关于苏北文化运动的意见[J].江淮,1941(5):16-22.
- [3] 刘少奇.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J].江淮文化,1941(2):591-597.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 [5] 李一氓.“五四”论根据地的文化[N].淮海报,1942-05-04(2).

- [6] 顾耿中.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音乐与音乐生活[J].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1999(4): 43 - 48.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共重庆市委.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 388.
- [8] 陈毅. 为广泛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斗争[N]. 江淮日报, 1941 - 04 - 18(1).
- [9] 刘则先, 刘小清. 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散记[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王阑西. 苏北盐阜抗日根据地木刻选集[M]. 内部资料, 1981: 24.
- [11] 李蒲星. 武器与工具: 中国革命美术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42.
- [12] 陈红. 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美术救亡活动述论[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 62 - 68.
- [13] 黄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162.
- [14] 曹建林. 苏北根据地抗战文艺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2.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Artworks in the N4A's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Northern Jiangsu

CHEN Hong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revolutionary artworks of the N4A (New Fourth Army) have been greatly inspired by the extensiv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The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f that area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revolutionary artistic cre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charm and artistic impact.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revolutionary artworks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mes, a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northern Jiangsu; revolutionary themes; artworks

〔责任编辑: 朱 根〕